

文史苑

(三)

- 茅盾在虹口
- 未名剧社——时代的幼苗
- 成人教育在虹口业大
- 虹口公园炸弹案内幕
- 从“外国牢监”说起
- “五·一九”屠杀
- 从“福民”到市四医院
- 跨越半个世纪的司麦脱衬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89

人民日报

1948年6月15日创刊 第10018号 1976年10月8日 星期五 农历丙辰年八月十五

人民日报

战无
继承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

人民日报

1948年6月15日创刊 第10020号 1976年10月10日 星期日 农历丙辰年八月十七

文见本刊81页《“四人帮”倒台的秘密信号》

目 录

中共“四大”会址的确认

矛盾在虹口

应修人和通信图书馆

——虹口区文化史话之三

未名剧社——时代的幼苗

成人教育在“虹口业大”

从澄衷学堂到澄衷中学

从“福民”到市四医院

虹口游泳池今昔

从“外国牢监”说起

虹口的基督教教堂

跨越半个世纪的司麦脱衬衫

虹口公园炸弹案内幕

从黑夜到天明

——上海监狱地下斗争史料

将军在黎明前就义

“五·一九”屠杀

——关于“宋公园十六烈士”的史料

“四人都”倒台的秘密信号

在印度破译日军密电码

张学良在上海

李嘉龙(1)

袁义勤(5)

柯思声(12)

于学伟(15)

蔡寿春(23)

张志康(28)

陈承融(35)

王宗宜(39)

刘邦云(42)

柯震(48)

卫元声(54)

张令澳(59)

刘邦云(66)

陈客(71)

沈立行(77)

张一爵(81)

邱沈钧 郑良佐(83)

钱可亭(91)

蒋百里之忆

曹聚仁 (93)

葛克信与葛克全

宋亚林 (96)

煦园旧事

赵朴 (100)

——中山先生的勤俭精神

我所知道的唐纳

任嘉尧 (102)

话剧演出在“孤岛”

丁芝 (110)

“白头记者”陆铿

赵朴 (113)

冯有真与《新疆视察记》

李秋生 (117)

——海外来稿

国立剧专余校长二三事

丁芝 (121)

“中旅”六十周年

潘泰封 (126)

旧上海历届教育局长

潘湛钧 (130)

《一张珍贵的照片》补志

刘公默 (138)

褚民谊伏法目击记

蒋光佩 (140)

海外内

(144)

《唐纳追思会将举行》等七则

虹口区民进简介

姜烈 (151)

中共“四大”会址的确认

李嘉龙

中国共产党迄今共开过13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有3次是在上海召开的。“一大”在卢湾区，“二大”在静安区，还有“四大”，现已查明在虹口区。

“四大”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重要会议，于1925年1月11—22日在上海举行。但究竟在上海何处召开，则长期以来未曾确定。不久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革命纪念地”问题的批文中，才正式确认：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为“四大”会址遗迹。那末它是怎样找到并确认的呢？

以往不少党史资料对“四大”会址均语焉不详，往往只说在上海闸北。1982年第9期《解放军画报》登载了一幅照片，并附说明：“图为‘四大’会址——上海闸北横浜路6号（四川北路横浜桥边一座居民住房）”。摄入镜头的是横浜桥的横浜河两岸房屋，而其主体则是横浜河北岸（今海伦西路）数间民房。它对“四大”会址提供了新的信息。但照片所指究竟是哪一间，则未予确切标明。其时正值区地名志办公室着手编写地名词典和区地名志，于是他们根据这一重要线索，经过数次实地观察，并向该地区街道、派出所及居住三十年以上的老住户了解。原来二十年代的横浜路即今东横浜路，门牌序号没有变动过，沿路有6号门牌，但系该

路24弄6号的后门，路上再无别的单独的6号。

经过实地查看，为了弄清情况，他们又去访问了《解放军画报》“四大”会址照片的拍摄者高祥惠。据告原始信息来自市博物馆，但是6号还是96号说不确切，所以照片取景范围较笼统。画报定为6号，可能是北京编辑部听了某些老同志的意见后确定的。于是他们把该东横浜路24弄6号的房屋从不同位置和角度拍了7张照片，并绘了一幅简明示意图，于1984年2月发函北京《解放军画报》，请求予以辨认，结果仍然未能肯定下来，遂把材料转到上海市文管会。

1984年5月，文管会经办人夏顺奎访问了当年参加“四大”会议担任纪录和向导的秘书郑超麟。当郑看了那张照片后，立即取出上海市市区地图加以核对，查到该处在横浜桥的北岸时，当即否定说：“‘四大’开会的地方，肯定在河的南岸，我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来到会场，对会址和出入线路的印象是比较深的。”

6月11日，夏顺奎约了区地名办负责人应云龙、陆仁福陪同郑超麟又进行实地踏勘。郑循当年参加会议所走的路线，先从四川北路向西进入川公路，走到淞沪铁路，再沿铁路往北走，到川公路与东宝兴路中间即原印度锡克教堂南面停下，指着铁路东面围墙里一幢六层新工房（即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说：“就在这个地方。这里原是一条弄堂，内有两三排房子是比较新的三层石库门房子。‘四大’租了其中一幢作为会址，门牌号码已记不清了。这里向东是北四川路，接近租界；向西过铁路是闸北华界；向南沿铁路可达北站，有三条线路可供疏散和撤离。可惜原来的房子已毁于炮火。”

据了解，郑超麟是参加“四大”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中唯

一健在的老同志，他提供的史料颇为翔实，是可信的。但为了郑重起见，尚需取得多方面的佐证。经过我们的努力，又取得了以下一些资料：

一、出席“四大”的上海代表、原上海地委委员长庄文恭生前曾有一份关于“四大”会址的谈话记录，我们是从“一大”纪念馆资料室摘录到的。庄对来访者说：“记得‘四大’是在一间里弄的房子里开的，好象在川公路附近，靠近闸北；里弄不很长，（会址）是在最后一幢房子里，天井很长，有厨房，是两上两下的房子。”他说会址在里弄最后一幢房子，查对《民国22年闸北区地图》，图中标出沿白保罗路（今新乡路）进去是和平坊，最后一幢房子就是郑超麟所指的地方，方位和房屋结构（里弄房子）也是一致的，只是两层和三层的不同。

二、原“一大”纪念馆馆长任武雄曾写过一篇《关于党的“二大”和“四大”》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说：“‘四大’会址在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面的华界地方，毗邻租界，是华界、租界警探均不易注意的地方。会议在一幢三上三下的石库门里弄房子里召开的，二楼房间布置成教室，有课桌黑板，会议就在此举行。万一有人闯进来，可以借口是私人办的英文补习班作掩护。三楼房间作为部分代表的临时寝室，大家在地板上睡觉。这个房子在‘四大’后一度作为工农部（一般称为工人部）的机关”。据了解，这篇文章是根据郑超麟、庄文恭的回忆撰写的，内容是一致的。

三、素居虹口的老报人柯愿声（又名柯震）在《关于“四大”会址与应修人烈士》一文（载虹口区政协《文史资料汇辑》第二集）中回忆说：“笔者在幼年时期，即1923—

1926年底，曾居住在东宝兴路254弄中的第二弄第二家（门牌号已记不清）。记得在当时，在总弄的第五条横弄东端通白保罗路与北四川路相交，它的西端有一条新里弄，靠近铁路前面，确有座西朝东的石库门房屋。……在记忆中，该处似乎只有二楼的石库门房屋，而不是三层楼。”

四、通过横浜街道干部盛介福，访问现住闸北区川公路233号老居民朱凤莲（1984年时77岁）。朱于1932年“一二八”前即住在“四大”遗址旁边，她亦证实当时有座三层旧式楼房。

通过当事人的回忆、现场察看，以及一些旁证资料，最后才确定“四大”会址为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的一幢三层石库门里弄房屋。至于两层还是三层，据分析，可能外观是两层楼，内部是假三层楼，这种房屋目前也还有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会址的确定。

于是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审定，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于1987年12月17日公布，正式予以确认。

（本文作者为中共虹口区党史办副主任）

茅盾在虹口

袁义勤

茅盾同志曾经三寓虹口。大革命失败后，自牯岭回沪，住在景云里；三十年代上半期，迁入大陆新村；抗战胜利后，他自重庆返上海，又居于大陆新村。

第一部小说的诞生地

1927年8月，茅盾从牯岭回到上海，寓居虹口横浜路景云里11号（丙），这是一幢单开间三层楼房子。他当时以被通缉之身，隐居在家中三楼，埋头写小说，整整十个月，这是他创作生涯的开始。

据他回忆，想写小说的愿望，是在一年前酝酿成熟的。当时在革命活动中，接触到许多“新女性”与情节曲折的故事，觉得是写小说的极好材料，他记得在一次大雨中，送一位女同志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此时各种形象在想象中纷纷出现，好似电影的片断。似乎已经听不到雨打伞的声音，忘记了还有个同伴，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他说，“如果能，我会在这大雨之中，撑一把伞，就动笔的。”现在如愿以偿，过去波涛起伏的生活在他脑中发酵，于是连续写成《幻灭》、《动摇》、《追求》三部小说，后来归为一部，便是《蚀》。《幻灭》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第一次用“茅盾”为笔名，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景云里，弄小人才，不是理想的写作环境。尤其是夏天，门外乘凉人多，往往闹声一片；再加上紧邻的大兴坊晚上牌声喧扰，使人无法构思。茅盾好在是白天写作，影响不大，只是难为了鲁迅。

就在1927年10月初旬，鲁迅先生也住进了景云里，由周建人陪同来看望茅盾，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是在一年前，鲁迅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之时）。接着在11月份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茅盾撰写的《鲁迅论》。这是叶圣陶认定茅盾是写文艺评论的老手，而专诚约稿的。在当时，人们对于鲁迅的小说与杂文，评价不一。《鲁迅论》在分析《呐喊》与《彷徨》中的一些人物时指出：“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怕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慷慨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文章也指出：“从鲁迅的杂文，可以看到他胸中燃着青春之火……”“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地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地剥脱自己。’”但文章发表后，却被一些人责为“一味吹捧”。而有的人攻击鲁迅，则说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甚至骂他是“绍兴师爷”……。现在看来，第一个对鲁迅作品写下正确评价的正是茅盾。

在景云里，茅盾还写了一些其他的文艺论文、散文与译文。在写完《追求》，陈望道来看他时，觉得他久居斗室，有碍健康。劝他：“既然你对外放空气说已去日本，何妨真的到日本去换换环境。”于是在1928年7月初，由陈望道带他悄悄离家，送上日本轮船，开始了东渡的亡命生活。

和鲁迅并肩战斗

茅盾在日本不到两年，于1930年4月初回沪，5月中便迁出景云里。到1933年4月又忙着搬家，这是按照“地下生活”的规则，一地不宜久住。这次迁入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三弄9号（今山阴路156弄29号），是由鲁迅介绍的。原来鲁迅的新居在大陆新村1弄9号，茅盾觉得和大先生住得靠近，遇事商量方便。虽然房租比较贵，一幢三层楼房月租要60元，不过当时他正好收到《子夜》的版税，经济比较宽裕，于是就用了沈明甫的化名，承租下来。

第一次寓居大陆新村的这段时间，是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日子。“钩命单”（黑名单）上有着茅盾与鲁迅的名字，这是他们二人并肩战斗的时期。1933年5月，丁玲、潘梓年在上海租界突遭绑架，诗人应修人在拒捕时牺牲。6月中杨杏佛被暗杀。后来又传出丁玲已被秘密杀害的消息。鲁迅接连写了《悼杨铨》、《悼丁君》两首诗。茅盾则写了《女作家丁玲》，以为悼念。这是他继《徐志摩论》后的又一篇作家论，当时无法在中国报刊上公开发表，便刊登在美国人伊罗生所编的英文《中国论坛》上。这篇文章论述了丁玲走过的文学道路——革命道路。

茅盾与鲁迅并肩战斗的一个重要阵地，是《申报·自由谈》。该刊自从黎烈文接编以来，在前期曾经是抨时政、砭锢弊的一个园地。可是到1933年5月，史量才顶不住国民党的高压，使黎烈文不得不在《自由谈》上登出吁请“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启事。尽管如此，黎烈文还是与鲁迅、茅盾商量好，换个笔名，继续供稿。《自由谈》后期，茅盾一共写了三十三篇文章。据他回忆，在1933至1934年中，鲁迅

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是鲁迅生平所写杂文中数量最多最集中、影响最广的时期。在这种影响中，当时写杂文蔚然成风。茅盾认为，《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可以说引来了杂文的全盛时期。

当时茅盾为后期《自由谈》所写的文章，并不算多。他的很多精力是用在《文学》方面。这是三十年代上海大型文艺刊物中寿命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刊物，创刊于1933年7月。编委会由鲁迅、茅盾、郑振译、傅东华、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等十人组成。主编名义上是傅东华，实际上审定创作稿件，以及撰写“社谈”与作品评论的文章，都归茅盾负责。创刊号上，茅盾的《枪刺尖上的文化》，不指名地批判了国民党的摧残新文学；鲁迅的《又论“第三种人”》，更富于战斗精神。出版后，创刊号曾经再版三次。为了介绍外国文学，茅盾与鲁迅、黎烈文共同发起，出版一种专载译著的刊物《译文》。又为了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他与鲁迅协助伊罗生选编一本（英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取名《草鞋脚》。

茅盾与鲁迅在并肩战斗中，他们的友谊也可以从小事中反映出来。1934年茅盾写了一篇《答国际文学社问》，交给鲁迅转往苏联。隔了几天见面时，鲁迅拿出一页自己亲手誊写的稿子交给茅盾，说：“你的原稿已经给萧三寄去了，我怕你没有留底稿，所以给你抄了一份。”茅盾在回忆录中写这件事时，说：“我是一个不易动感情的人，可是鲁迅这几句平淡的话却使我激动不已，因为从这件似属平凡的小事中，透出了鲁迅对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敬仰，对战友的关怀，以及对工作的一丝不苟。鲁迅手抄的这份原稿，象征着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一直把它珍藏着，……”

在这段时间里，茅盾在写作中以论文为多，未能以主要精力搞创作。有一篇《上海大年夜》（指农历除夕），写于1934年2月，是实地考察的记录：“南京路的商店只有两家半是赚钱的，这两家是三阳南货店和五芳斋糕团点心店，那半家是冠生园。”……“但是南京路上小小的红庙，确实非挤不能进去，来这红庙烧香的是大商人的眷属，也有高等妓女。并且沪西某大佛寺大小厅堂乃至‘方丈室’早已被施主们排日定完，这半年里，想在那大佛寺里做‘道场’，简直非有大面子不行。这就是1933年的上海大年夜。”

在大陆新村3弄9号茅盾住了两年。他原有继《子夜》之后再撰写一本长篇小说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他比喻当年文坛的斗争，就好比练拳的人“打沙包”，把一个一个扑上身来的“沙包”打开去。这样，就无法把主要精力用到创作方面来。到了1935年春，由于知道他住址的人日渐增多，也因为要紧缩开支，便迁居到极司非尔路（现万航渡路），房租较低的信义村。

“茅盾的苦闷”

经过8年抗战，茅盾自重庆经穗、港返抵上海，是1946年5月下旬。6月中旬，《侨声报》上刊登了署名鲁迅的一篇文章《茅盾的苦闷》，文中提到茅盾尚未觅得住处，无法写作。最近据范泉同志对笔者谈，当时茅盾的住所是很小的。施高塔路大陆新村1弄6号（今山阴路132弄6号）这幢房子，原是欧阳翠与范泉居住的，通过孔另境的联系，他们把二楼正房让出来给茅盾，客堂间公用。家具一部份是茅盾抗战前托孔另境代管之物，一部份是孔与范泉从旧货市场代为买来的。三十年代茅盾住大陆新村时，是三上三下一栋

楼，现在只有一间房，难以相比了。由于战时艰苦，他毫无积蓄。范泉当时在永祥印书馆任职，曾以预支稿费的方式，为茅盾筹措一些款项。

当时确也“无法写作”，不仅是住房挤的问题，每天报刊、信件一大捆，来客络绎不绝，拜会、访问、约稿、商量问题，其中以约稿者为多，也有不少前来求教的文学青年。听丁景唐同志谈，他和杨志诚同志当时是“文艺青年联谊会”的干部，曾代表该会往大陆新村邀请茅盾同志出席欢迎会发表演讲。茅盾十分关怀文学青年，在接待中谈到，中国有这么多爱好文艺的青年，他们是文艺阵地的士兵，而作家就好像是部队的军长和师长。但这中间还缺少连排长。他鼓励“文艺青年联谊会”要多做连排长的工作。就这样，一谈就是一个上午。由于白天时间紧，茅盾总是在晚上挤出时间写文章。其时正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期，为了揭露美蒋勾结的真相，他写得最多的是杂文。鲁迅逝世十周年时，他写了《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文章说，“鲁迅全部的遗教都是要我们莫存幻想，……。现在是强盗混在人群中大喊捉贼，……抓住了被打者的手却还自称是调停，……。”另一种斗争方式是发表宣言，如二百五十九人签名的《上海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等等。各方争来约稿，总是应接不暇，他先后为《文汇报》、《联合晚报》《时代》周刊、《周报》、《民主》、《文萃》、《文艺春秋》等二十多种报刊写了不少文章。据朱雯同志告诉笔者，他当时为《大众夜报》编《七月》（文艺周刊），这张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办的报纸，竟悄悄地出现了进步副刊。茅盾曾经写过几篇稿子，其中有一篇是《周作人的“知惭愧”》，此文曾被一家刊物转载。后来《茅盾资料汇编》（这本书名已记

不清楚)中就以转载的刊物,作为此文的出处,却忘了最初发表这篇杂文的刊物是《七月》。由于《七月》所刊登的大都是茅盾、巴金、靳以、李健吾、风子、罗洪等进步作家的作品,所以只出了九期,就被报社认为“有左的倾向”,而撤销了这一副刊。

在这年12月初旬,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出国去苏联观光。郭沫若特为赠诗《送茅盾赴苏联》:

“以文会友御长风,祖国灵魂待铸中;石取他山攻玉错,政由俗革贵农工。北辰历历群星拱,罗马条条大路通;海运天池南旋日,九州当已庆攸同”。茅盾自苏联回来时,已是1947年4月下旬,国内局势更为严峻。隔了一个月,《文汇报》、《联合晚报》与《新民晚报》这三家进步报纸同时被勒令停刊。于是作家们只好更多地参加政治运动而少写文章。茅盾则因为刚刚访苏归来,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苏联上。

到了这年10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主同盟,于是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先后秘密离沪去香港。“祖国灵魂待铸中”,茅盾也于12月上旬,离开他在虹口的最后寓所——大陆新村1弄6号,秘密前往香港,转移到新阵地,迎接全国的解放。

应修人和通信图书馆

——虹口区文化史话之三

柯思声

应修人烈士是著名诗人，曾与冯雪峰等人结成“湖畔诗社”，1925年入党，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他是当时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成员、江苏省委委员，1933年5月4日在沪壮烈牺牲。

大约在1926年底，笔者还只11岁时，曾随母亲从广吉里（即今东宝兴路254弄，亦叫和平坊）搬到应家居住。虽然我们与他家只是“二房东”与“三房客”关系，但不久，由于我母亲与他母亲相处极好，便成为很熟悉的朋友，并在搬离他家以后，仍然常来常往。

他当时住的是一幢砖木结构二层楼石库门房子，客堂间后面是他父母的房间，二楼前楼是他与原配夫人郑绛仙的房间，后楼租给我们居住，亭子间是他岳父母与妻舅居住。地址是北四川路克明路天寿里91号（即今四川北路永明路135弄）。

应修人烈士的老父是千顷堂书店（在河南中路）的老店员，为人非常诚朴，我叫他“阿羊爸爸”。他的岳父母本来在日本开裁缝铺，1926年带了他的妻舅郑衍华从日本回国。初回国时，郑衍华的中国话讲不大好，但口琴吹得很好（当

时王庆勋、石久望等尚未在沪推广口琴复音吹奏法)。

最近，我曾去永明路135弄察看，见弄口已恢复天寿里原名。但可惜当时天寿里的102幢房子目前仅存几条横弄上的数十幢，直弄的数十幢在“八·一三”沪战中毁于炮火，已全部改建，成为一家工厂与二幢五层楼的新工房。据我对照横弄地位，认出应修人烈士所住的91号与“通信图书馆”所在的90号，约在今第一幢工房的北端，即今16号处。

记得当年天寿里是一条较新的里弄，房屋结构很好，租金较贵，每幢月租20银元。弄内一般人家的居住状况颇似“七十二家房客”，而应家却独住一幢，只分租出一间后楼，此种情况在弄内是为数不多的。

如今我回想起来，我母亲和我能凑巧成为他家的“三房客”，主要原因是我家人口简单，仅一个40岁不到的知识分子——我的母亲，和一个11岁的男孩——我。

记得当年他家客堂间经常有些青年男女和学生模样的人来，他们活泼地谈笑，男女交往不拘旧俗。那时我只是读五年级的小学生，他们把我看成小弟弟。有好几次，他们带我到隔壁90号楼上的“通信图书馆”去玩，90号的天井搭了天棚，开了一爿烟杂油酱店，有两个老年营业员（当时叫作伙计）。从后门进去，楼上就是“通信图书馆”，整个楼上都陈列着装满书籍的书架，就象现在图书馆的书库，但未见有人去阅览和借书。亭子间可能是一个办公室。90号除楼下的小店外，没有住家在内。至于这爿小店与图书馆是否有关，则不清楚。

(二)

当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北伐军与上海工人把北洋军阀